



The Ethnographer's Magic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 George W. Stocking

西学

源流

甘 阳 刘小枫 主编

人类学家的魔法

人类学史论集

〔美〕乔治·史铎金 著

赵丙祥 译



西学 源流

人类学家的魔法 人类学史论集

[美] 乔治·史铎金 著
赵丙祥 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类学家的魔法：人类学史论集 / (美) 乔治·史铎金著；赵丙祥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3
(西学源流)
ISBN 978-7-108-06350-2

I. ①人… II. ①乔… ②赵… III. ①人类学—文集
IV. ①Q9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45299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董可依

装帧设计 薛宇

责任校对 常高峰

责任印制 宋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7-755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7.625

字 数 413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6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总序：重新阅读西方

甘 阳 刘小枫

上世纪初，中国学人曾提出中国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说法，但他们当时似乎没有想过，西方史何尝不是层累地造成的？究其原因，当时的中国人之所以提出这一“层累说”，其实是认为中国史多是迷信、神话、错误，同时又道听途说以为西方史体现了科学、理性、真理。用顾颉刚的话说，由于胡适博士“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他们那一代学人顿悟中国的古书多是“伪书”，而中国的古史也就是用“伪书”伪造出来的“伪史”。当时的人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胡博士等带回来的所谓西洋史学是否同样可能是由“西洋伪书”伪造成的“西洋伪史”？

不太夸张地说，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留学”号称是要到西方去寻找真理来批判中国的错误。以这种病夫心态和病夫头脑去看西方，首先造就的是中国的病态知识分子，其次形成的是中国的种种病态言论和病态学术，其特点是一方面不断把西方学术浅薄化、工具化、万金油化，而另一方面则

又不断把中国文明简单化、歪曲化、妖魔化。这种病态阅读西方的习性，方是现代中国种种问题的真正病灶之一。

新世纪的新一代中国学人需要摆脱这种病态心理，开始重新阅读西方。所谓“重新”，不是要到西方再去收罗什么新的偏方秘方，而是要端正心态，首先确立自我，以一个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西方的方式首先是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者知道，西方如有什么药方秘诀，首先医治的是西方本身的病，例如柏拉图哲学要治的是古希腊民主的病，奥古斯丁神学要治的是古罗马公民的病，而马基雅维史学要治的是基督教的病，罗尔斯的正义论要治的是英美功利主义的病，尼采、海德格尔要治的是欧洲形而上学的病，唯有按照这种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方能真正了解西方思想学术所为何事。简言之，健康阅读西方之道不同于以往的病态阅读西方者，在于这种阅读关注的首先是西方本身的问题及其展开，而不是要到西方去找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

健康阅读西方的人因此将根本拒绝泛泛的中西文明比较。健康阅读西方的人更感兴趣的首先是比较西方文明内部的种种差异矛盾冲突，例如西方文明两大源头（希腊与希伯来）的冲突，西方古典思想与西方现代思想的冲突，英国体制与美国体制的差异，美国内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消长，等等。健康阅读者认为，不先梳理西方文明内部的这些差异矛盾冲突，那么，无论是构架二元对立的中西文明比较，还是鼓吹什么“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中西文化调和，都只能是不知所谓。

健康阅读西方的中国人对西方的思想制度首先抱持的是存疑的态度，而对当代西方学院内的种种新潮异说更首先抱持警

惕的态度。因为健康阅读西方者有理由怀疑，西方学术现在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流行名词翻新越快，时髦异说更替越频，只能越表明这类学术的泡沫化。健康阅读西方的中国人尤其对西方学院内虚张声势的所谓“反西方中心论”抱善意的嘲笑态度，因为健康阅读者知道这类论调虽然原始动机善良，但其结果往往只不过是走向更狭隘的西方中心论，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是也。

希望以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重新阅读西方的中国人正在多起来，因此有这套“西学源流”丛书。这套丛书的选题大体比较偏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方学界对西方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家的细读诠释，二是西方学界对西方文明史上某些重要问题之历史演变的辨析梳理，三是所谓“学科史”方面的研究，即对当代各种学科形成过程及其问题的考察和反思。这套丛书没有一本会提供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因为这些作者关注讨论的是西方本身的问题。但我们以为，中国学人之研究西方，需要避免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的心态，那种急于用简便方式把西方思想制度“移植”到中国来的做法，都是注定不成功的。事实上西方的种种流行观念例如民主自由等等本身都是歧义丛生的概念。新一代中国学人应该力求首先进入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深入考察西方内部的种种辩论以及各种相互矛盾的观念和主张，方能知其利弊得失所在，形成自己权衡取舍的广阔视野。

二十年前，我们曾为三联书店主编“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两种，当时我们的工作曾得到诸多学术前辈的鼎力支持。如今这些前辈学者大多都已仙逝，令人不胜感慨。

学术的生长端赖于传承和积累，我们少年时即曾深受朱生豪、罗念生等翻译作品的滋润，青年时代又曾有幸得遇我国西学研究前辈洪谦、宗白华、熊伟、贺麟、王玖兴、杨一之、王太庆等师长，谆谆教导，终生难忘。正是这些前辈学人使我们明白，以健康的心态和健康的头脑去阅读西方，是中国思想和中国学术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我们愿以这套“西学源流”丛书纪念这些师长，以表我们的感激之情，同时亦愿这套丛书与中国新一代的健康阅读者同步成长！

2006年元旦

我在1968年应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之邀到该系任教，也在历史系蒙赐一个教席。到1974年，当一批历史学家拒绝同意人类学家推荐我担任正教授时，我只好辞去了在历史系的教职，才算缓和了当时的僵局——虽然在那以后我还保留着一个“准成员”的边缘身份。在那时，我从非正式渠道听说，历史学家们的一个拒绝理由是，虽然我也能画画插图，但算不上一个“大手笔”。这种评论颇叫人尴尬，但也不全是空穴来风。我没有什么专著。有几部是没有完成的（Stocking 1991c），有两部出版的也都不是传统的历史叙事，虽然它们探讨的都是重大主题。正如副标题显示的，第一部，《种族、文化与进化》，是一系列“人类学史论文集”（Stocking 1968a）；第二部，《维多利亚时代人类学》（Stocking 1987a）也可以这样解读，虽然它的“多重语境化”在结构上可能比有些读者预想的更有一体性。 4

在这些论著出版间隙的二十年间，我还写了一些论文，其总量要超过一本专著不少。但是，它们的影响却分散在各种专业期刊和文集当中（如 Stocking 1973a）。因为有些论文收入了我从1983年起为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编的“人类学史”系列，将它们

收集起来编成单卷本，再收入一些发表在他处的文章，听起来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案。这样一本书不仅对只读过其中几篇文章的读者，对以前从不知道它们的更广的读者也是有用的。

虽然这些文章处理的是两种国别人类学传统的分散事件，但我在编选时已经考虑过它们彼此重叠的一致性了。它们跨越了人类学史上的一个世纪，在此百年间，一种以旅行记录为基础、在机构和思想上都散见的话语最终变成了一门以系统民族志考察为根基的专业学科。在这个时间跨度内，它们主要关注两个人物，他们不但在现代民族志田野工作的发展和人类学的学科制度化过程中影响深远，在各自的国别传统中也无出其右者：弗朗兹·鲍亚士（Franz Boas）和布劳尼斯娄·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考虑到他们都已经有了全面的传记，这些文章因是利用未出版的手稿材料而做的深入研究，故可一时充当他们的著作和生平的指引（又见 Stocking 1968a, 1984b, 1986b）。除了研究以学术为基础的田野工作传统的发展以外，它们也处理人类学史上的不同重要主题，虽然是以递归性微观的方式：人类学的强大神话面向及其一以贯之的浪漫原始主义；人类学在更大社会政治场域中的含混、反讽和悖论；人类学对各种自然科学研究和人文科学研究不无问题的整合；以及其一般化科学志向和主观获取的“素材”之间无所不在的张力。为了给这些以事件为主的文章提供一个背景或概观，我选入了一篇涵盖整个人类学史的尝试之作，虽然考虑到它的评论性质而只能将它置于卷末，但有些读者也许愿意先读它，将它看作一种路引，而不是总结。

不过，还有另外一组主题，在正文中不易看出，而在每篇论文卷首的小序中则较为显眼。这些主题涉及我自己与人类学学科的边缘关系，以及我作为人类学的主要史学家在数十年间扮演的

角色。虽然我是应人类学家之邀前往芝加哥大学的，我以前在伯克利分校的教职却是在历史系，我也始终自认是一个历史学家。我在1960年到伯克利分校教授美国社会史，转向人类学史多少事出偶然，虽然在我以美国社会科学家和种族理论为题的博士论文中已经不无迹象。在我到芝加哥大学不久，我应邀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会主办的人类学史会议（Hymes 1962）。邀请函是A. I. 霍洛威尔寄来的，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时就参加了他的人类学史席明纳，他还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之一，他是这个会议幕后的领导人物。回想起来，显然，这次会议——在与会者中，我是人类学群体中的四个历史学家之一——既给了我一个平台，也给了我一些听众。

在同一时期，《行为科学史杂志》的创刊给我的史志事业开辟了一个更广的天地。虽然我那时并不这么想，但如今却不一样了，我在1965年写的编者评论文章《论行为科学之历史编纂学中的现时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缺点》可以视为一种尝试，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当前的学科信条已经严重扭曲了对学科过去的理解，我试图开出一张方法论处方，为公正的专业史学家划出一方领地（参见Stocking 1966, 1967）。从那以来，我的工作领域是道德、社会、行为或人文科学的学术史，并在总体上延伸到科学史。但如果说我将自己的专业身份定位在这个方向上，我的主要学术关怀却基本上受制于我就职之处，也就是公认的本国最知名的人类学系。

即便不说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氛围也可以说是非同寻常，足以让我有别于大多数人文科学学科的史学家。许多史学家都有他们自己的基本认同，或者是思想史学家，或者是文化史学家，以自己之所有，供他人之所无（Stanton 1960）；他们不会跨行触碰其他领域的题目，因之，他们也没有高远的信条去捍卫或改变他们为之写作历史的学科，虽然历史主义的相对化思潮，尤其是在

近期的模式中，也许还能在总体上带来一些颠覆性的效果。另外一种史学家只是一些思想史爱好者，主要是为他们本行的人文科学学科成员写作，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出于党同伐异的明确目的（Harris 1968）。由于自1960年以来，科学史家在数量上急剧增加，这两种类型并没有穷尽学科史学家的全部，但他们都极力划定我所进入的思想竞技场（GS 1967）。

6 与第一个群体相反，在科系的认同上，我当然是一个人类学家；虽然我将自己的工作看作更广的人文科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学却始终是我的首选，而人类学家也是我的基本听众。但与第二个群体相反之处在于，我认为我的历史编纂学是一门全日制职业手艺——相对来说没有利益纠葛，宽泛地说语境化，更多地指向过去而非现在。我的主要人类学参照点仍然坐落在我的博士论文涉及的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与我的同人们正好相反，他们的参照点是在他们在校教育期间形成的，也许又在间隔的岁月中受到重塑。另一方面，由于我的阅读大多是在人类学的过去，也在指导学生，听取申请，论文答辩，院系会议和走廊谈话等日常层次上，我一直置身于人类学学科的日常生活中，而大概只有思想上的耳濡目染，我对其当前的关怀才有了一些切身体悟。如果说，在过去的岁月中，这个位置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它也带来了问题——但无论如何也不是什么芝加哥中心论的。

其困难的一个标志是，我实际上从未能写出一部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的历史。我曾经想过，将我的系视为20世纪人类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观察其具体而微的思想与制度生活。但虽然我可以方便地使用大量手稿材料，可以访问健在的对象，我还收到几百份校友问卷的答卷，有些真是丰富之极，

但我发现几乎不可能超越第三章——这大约也是我目前的有些同事开始成为主要角色的时间节点。过去的问题和人物开始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当前的问题和人物；一旦不再是一个依据静默死者的文献来写作的历史学家，我开始更敏锐地感到了我的学科边缘地位。我可以想象自己是一个无涉利益纠葛的现场观察者，在系会上观察潜在分裂问题的两造，并经常在需要投票时弃权。但在事实上，我也是一个共谋的话事人，也会操心本系的现状和我的位置，而这已经在我对其过去的研究中有所显示了。最终，所有我写成的不过是一份图书馆展览目录；虽然我努力想以一种非庆祝的方式严肃地写出一部系史，但它事实上无非是作为五十周年系庆的一部分公开印行罢了（Stocking 1979a）。

我对系史研究的困难在一般学科层次上也有反响。我是经由人类学史这扇后门溜进人类学的，而没有经由其当前的关怀这个前门，并且自认最终是一个历史学观察者而不是一个人类学参与者，但我对这个学科的近期历史并不感到十分满意，在界定其将来时也犹疑不决——我只好自我安慰说，如果它明天关门的话，我自己的历史志业也就再也不需要素材了。但毋庸多说，从我在1960年代后期进入人类学以来，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年正是所谓“人类学危机”开始爆发之时：一系列彼此纠结的问题纷至沓来，如现场观察的、方法论的、认识论的、理论的、伦理的和人口地理学的，与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的焦虑一样，紧跟在欧洲殖民主义终结之际，在国外，后殖民时代的战争此起彼伏，在国内，则是激进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参见 Stocking 1982b, 1983b）。但毫无疑问，今日的人类学在许多方面都截然不同于“今日人类学”——这是1952年一个研讨会的名称，它仍然是我刚刚接触这个领域时的一个基本参照点（Kroeber 1953）。

虽然在研究生期间我只研修过霍洛威尔的两门人类学课程，我最近（在主持“危机前”和“再发明”人类学席明纳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我自己的思想取向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受到1950年代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界定，它对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洲文明研究计划发生过重大影响。一边在伯克利教授史学，一边修改我的博士论文时，我放弃了历史学必须系统地采纳社会科学方法的想法，在那以后，我成了一个在对1950年代实证主义的思想批判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类学系的一员。但在我自己的思想中仍有大量实证主义成分，由此，我对人类学的科学化潮流怀有某种思想上的同情之感，也在对近期所谓的文学化相对主义怀有同情理解的同时又不无疑虑之心。仿佛是在应答一位成长于50年代的巨擘的类似犹疑之感（Geertz 1984），我有时候情不自禁地想，我也许就是一个“反-反-反-相对主义者”；而对其他人，也许要减少一个或几个对偶前缀词。

我与某些当代人类学思潮的暧昧关系在涉及“后现代主义”时更为明显。在多少有些不甘地承认它是当代文化生活的一种现状时，我更不愿接受它是一种理解过去的立场。在我于1988年至1989年到盖蒂中心从事艺术与人文科学史研究前，我只是模模糊糊知道这种现象（如果它可以用单数的话）。但居住在洛杉矶，与艺术史家一道消磨时光，和乔治·马尔库斯共享思想友谊（他是人类学新思潮最有影响力的代言人），我却无法对之视而不见，自那以后，我对它有了直接的体察（参见Stephens 1990）。然而，在被要求给它下一个定义时，我不由得想引用一位朋友几年前在美国人类学会上复述某位杰出的后现代建筑师在鸡尾酒会上的解颐妙语。据说这位无比可靠的权威声称，POMO（后现代）的确定标准是双重的：“历史任你来装扮”；“东钻西窜如傻狗”。在挪用

这一对说法比拟我自己的反复无常时，我后来有时刻薄地将之改成“时空乱”（anachronism）和“无厘头”（non sequitur）。但当我随后把这些说法传给一个崇信后现代的历史学家时，他回赠了一种更贴切的译法，“拼贴”（pastiche）和“去中”（decentering）（参见 Megill 1989）。

虽然在这种连续的逸闻式翻译过程中，后现代主义的风味越来越淡了，但从几个特别的观点来看，我似乎领悟了这一现象的基本方面。而从我自己的口味来说，从“傻狗”到“无厘头”再到“去中”，多少有些颠来覆去，而从“历史任装扮”到“时空乱”再到“拼贴”，则仍然将第一条标准关在一座现时主义的反历史牢笼里面。虽说我对历史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方案怀有同情之心，但在与今天那些早早就已经稔熟于解构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学生相处时，又让我感到，历史学家的使命有时必须被理解作为一种再熟悉化（refamiliarization）的工作。在这种情境下，历史主义虽曾以过去的差异性和断裂性呈现在面前，如今却又必须坚持一致性和连续性。

与此同时，我近来越来越意识到，我自己的历史学不但不是去中的，在今日还很有可能被称作是教条式的。虽说我的博士论文在一开始是用准定量方法研究几百个社会科学家的著作（而不是少数“代表人物”），但从那以后，我的工作却大都关注人类学主流传统中的主流范式观的主要人物（参见 Stocking 1983b）。我没有刻意拯救那些被忽视的范式方案的先驱人物，他们曾经销声匿迹，如今又重返人间（Vincent 1990）；也没有从那些一直被当作人类学研究对象之“他者”的立场，以历史的眼光检视人类学（Fabian 1983）。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替代性历史，都能取得丰硕的成果，绝对有必要加以历史编纂学的和批评性的考察。但我自

- 9 自己的工作基本上只研究了学科发展主线上广为人知的人类学家。以历史的方式重温他们的理解，这在我看来仍是有效的、必要的方法。我赢得的一次最佳褒奖来自鲍亚士晚年的一位门徒，他对我说，“你把鲍亚士还给了我们”。——在他死后多年间，他的工作被很多人，甚至至今有时候仍是如此，视为几乎没有正面的理论价值之后（例如 Wax 1986），我终于将他还给了圣典（canon）。

然而，近年来，圣典问题又在另一个意义上出现了，这与我的身份有关，也与我的史学研究的内容有关。在作为一个外人进入人类学后，我得到了一席之地，成为一位本族历史编纂学家，而我的工作也一度赢得赞誉多于批评。但最近，批评的声音开始指向这个领域的“教长”或“元老”；我的工作被指责是非理论的或归纳性的（Jarvie 1989），缺少与当前人类学论争的关联性（Kuper 1991），还有，从人类学史中驱逐了人类学家（Winkin 1986）。

我无意在此作全面答复，也不是表明我没有捍卫一般理论取向，或想要直接以历史的方式阐明当前的理论问题，我只想说，我在1965年倡导的纲领性“历史主义”早已因我在人类学家群体中的居留而得到了证实，并经受住了进一步的历史编纂学反思。这些都让我更欣赏当前学术兴趣在定义历史研究领域中的角色，各种培育历史感悟力的方式，以及评价它的不同标准（参见 Stocking 1982c）。这都反映在我自己的写作中和我参与的各种编辑角色中。

在为“人类学史”系列（HOA）丛书选择焦点时，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它们如何与当前的学科关怀形成共鸣（Stocking 1983a）。如果有些关怀（田野工作的不确定特征，结构功能主义重估，民族志研究的殖民场景）在1980年代被认为过时了，但它们在1960年代以来曾经是问题，至少其中有一个关怀（博物馆和物质文化

的角色 [Stocking 1985]) 引发了一波持续高涨的兴趣。不只如此, 这个丛书系列被特意安排为一次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合作事业, 双方都在编委会中有实质性的代表, 每一卷都收入了两个群体的文稿。

共鸣和代表的目标受制于在这个少人耕耘的领域中材料的可用性。“人类学史”系列没有约过稿, 但在准备某一卷时, 都会尽力搜集与主题相关的“现成”文稿, 准备出版, 此外无他。我们不是从候选作者群中选出一些, 请他们恰到好处地撰写共鸣性的和代表性的文章, 以全面地处理某卷主题的所有方面, 我们通常都是搜集分散在某个一般主题领域内的论文, 然后赋予它们一种事后的统一性。

10

但除了这些外在的制约, 想在一个缺兵少将的领域中实现共鸣和代表性的企图也一直受制于编委会对“历史学家的技艺”的看法, 我们推崇一种以历史的特殊来处理一般问题的方法, 以及文学风格的表述方式。虽然人类学评论家、福柯主义者、解构主义者和新历史主义者大都仍未将“人类学史”当作一个合适的会所, 它仍然面向“文学化的”而非“科学化的”人类学思潮敞开, 以至一位作为前者在美国当代人类学界之喉舌的法国评论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Jorion 1985)。同样, 虽然它一直没有全面地致力于人类学批评, 其主导方案的历史化倾向却始终间接地为那个会所做着贡献。这就是全部, 尽管我自己对其中某些问题不无暧昧。

在此对“人类学史”系列的编辑策略作这份简要补充, 无非意在表明, 我自己的历史编纂学是怎样与从我进入这个领域后兴起的各种思潮发生关联的——对这些思潮, 我更愿意称之为“新现时主义”(neopresentism)(与“新历史主义”[neohistoricism]这个标题正好相反, 后者事实上只适用于某些思潮)。至少, 这种

初始的自我解构过程会给更有现时主义风格的评论者提供某些指引。但我希望，它也表明了某种精神，我曾以此自励，开展人类学史的研究——到如今，弹指间数十载韶光已逝，也许我还能继续前行若干岁月。如果有人问，cui bono?（何人得益？）那么，我只想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每个阵营的学者都会受益无穷。

除了这些一般的历史编纂学反思外，还应该对这卷文集本身多说几句。我为每篇文章所撰的小序提供了更具体的语境，说明了它的缘起，也简要地说明了其历史编纂学的或内容方面的特定问题。我没有打算对文章本身加以修订或更新，但有少许删节，少许略嫌密集的插话式补充，并偶然提到一些相关的近期人类学史工作。不过，可以肯定地说，我没有打算全面更新参考文献；对于更详尽的近期文献索引，读者诸君可以查阅各期《人类学史通讯》，以及保罗·埃里克森汇编的书目（Erickson 1984-1988），《伊希斯》（*Isis*）的年度评论书目也可资利用。我尽可能以删减或交互参照的办法，以消除或减少这些文章在引用同一些历史材料时的冗余之弊；但假如这有可能造成行文或论证的断裂时，我只能保留这种重复。

在为人类学家写作时，我很久以来就已经做了一种调整，即采纳（在“人类学史”系列中有所微调）他们的纪录片风格，有简短的随文注，数量有限的实质性脚注，以及一份引用书目名单。虽然这很适合人类学模式（而不是只考虑作者的方便），但它与传统历史学文献注释不同。对于那些对我在“方法论价值”标题下所称的学科话语分化（见第279页*）有兴趣的读者也许不无意

* 文中括注“见第×页”，均指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编者